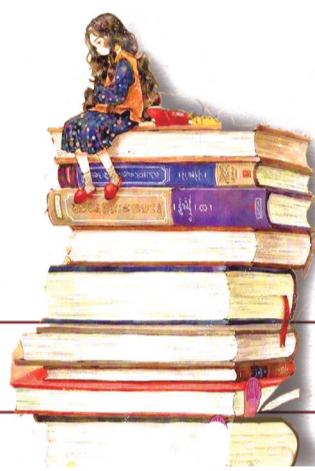


拥抱丰沛的春光

□原
因



生命的水滴与时代的江河同行，记忆的溪流曲折弯细又长……

在废墟被蓝图照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来自湖南的父母，主动申请调往白族聚居的云南省剑川县教书育人。襁褓中的我，也就随之在那里安身。听五星红旗在耳旁呼啦啦招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等红色经典伴着我茁壮成长。

但道路总是曲折的，岁月无奈地闯进了一个迷宫。1969年1月，15岁的我被安排到剑川县最偏远的山区弥沙公社插队落户。在那贫瘠的农村，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是困苦。几块土墼在地面上围个圈，铺上稻草，裹一床薄薄的棉被，就是被回荡在山谷的犬吠伴眠的夜晚。一锅干蔓茎汤里撒几把苞谷面粉搅一搅，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有一次在粮管所排长队领到了救济粮，我们竟

辉煌七十年
筑梦新时代



在粮库外就地用三块石头垒了个灶，用随身带来的罗锅煮粥，还半生半熟，就开始狼吞虎咽。那年月，我们有时会相互用手指头按压对方的脸庞，以那个凹陷的小肉坑回复原状的快慢决定谁来洗碗。因为饥饿，我们的脸经常会有些浮肿。也因为饥饿，我们变得落拓不羁有时甚至为行无状。比之我们，村民的生活就更加窘困了。如今数十年过去，春风已度玉门关，村里也已基本衣食无虞。

由于从小就沉浸于白族生活氛围中，白族话几乎成了我的母语。这极大地便利我融入边地山村。同身受失望中孕育的希望，咀嚼品味苦涩里暗藏的鲜活。我感谢生命里所有的遭遇。一些沉重的悲剧和轻松的喜剧，后来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正如曾经出现在现实中。

在过了5年的知青岁月之后，同学们先后被分配工作了，只有我独自一人因政审不合格而一次次落选。我的一篇短文曾写到从极度的沮丧中奔突而出的另一个自我。挫折是心灵丰富蕴藏的一种加持吗？我不知道。但也许因为这样，我写的文章才会显得深沉一些。

1973年，“文革”后实行的由贫下中农推荐入学的高校招生制度增加了文化考试的选拔环节。消息传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我有幸获推荐进入了考场并名列县考生榜首。然而，张铁生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横空出世了，高分考生们瞬间被贴上“不务正业、道遥浪荡的书呆子”的标签，录取标准骤然转向。在丰盈多姿的人生路上，注定要经历风雨。那是一个国家民族命运多舛的年代，去哪里寻求个人的坦途？

5年后，已进入1978年的秋天，抬头举目依然有红花绿叶进入视线，因为我已离开苦寒边远的剑川，抵达昆明。而昆明的春意不仅彰显在自然界，它已悄悄渗入人心的冻土。一天下午，学校传达了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走出礼堂，同学们不约而同来到操场，先是艺术系的同学，继而是体育系的同学，手拉手跳起了《圆舞曲》。

……

白鸽在天空中展翅飞翔/青春的花朵在心中开放

……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

优美又燃烧着青春热情的旋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望中的同学。在漫长的年月里，跳舞曾经是一种大逆不道，但它却在这一刻真真切切，堂而皇之地如花朵一般绽放了。圈子越来越大，舞步由拘谨逐渐变得奔放，表情由羞怯逐渐变得自如，仿佛花瓣挣脱了一切束缚，纵情舒张……然而，让人伤感的是，侧脸一看，与自己并排踏歌起舞的，却是一个比自己小七八岁的姑娘，一缕悲情不禁在心中潜滋暗长。在过迟推开的校门里追忆青春。在当时，不仅是我个人的心思，也是我们这代人最令人五味杂陈的誓言。真实的感受，促使我写下了第一篇发表于省报的散文。

春风鼓荡而来了，暖阳不止在崎岖小径徘徊，而是让所有的枝条都挂满了妩媚。忆当年，最难忘的是大河解冻时阳光的晃亮和激荡。阳光打在人们脸上也照进了他们心里。而文学是其中最炫目的那一道。走来了刘心武的《班主任》，驶来了舒婷的《三桅船》。当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声音传来时，张洁喃喃地述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他们的讲述、歌吟、呐喊，与滚滚向前的时代浪潮同频共振，有力地拍击着中国人的心房。对伤痕进行检视，让人性复苏，使常识归位，文学已不仅仅是文学，它是创可贴，醒脑汤、能量合剂，它更是火，是电，是山谷里炸响的惊雷。

虽然我考上的物理系，这劈头而来的文学狂浪却引我调转了船头。当初之所以选择报考理工科，源于心有余悸。父亲的被划“右派”，跟他从事文职工作有关。“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家长的竭力主张使我放弃了自幼的喜爱。但新时代的大潮冲开了多少人心中的藩篱，也使我有了鸳梦重温的可能。我的枕边开始堆满了各种过去看不到的文史哲名著。国门打开，

有新风习习拂面，让人眼界大开。

其实，早在八九岁时我就已经开始阅读文学书籍，到了“文革”时期，最幸运的是鲁迅的书没被禁读。而那年月我物色到的一本破旧的《普希金抒情诗歌集》，让我对诗歌产生了宗教般的崇敬。在知青生活中，惠特曼、聂鲁达、洛尔迦曾陪伴我驱除寂寞。一本杜甫诗选被我的眼睛反复揉搓。那些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的阅读，为我在大学以不务正业的姿势向文学张望垒砌了站立的台阶。

陪一位著名老诗人采风是我工作调动后的第一次任务。

宽脸膛，肤色较黑，头发短而有点卷曲，穿一身工人师傅们常穿的劳动布工装，脚上的旅行鞋灰黄灰黄的，似敷了一层泥，但上衣的钮孔里，却斜插着一枝野花——这是我初见他时的印象。有着游吟诗人气质的他，也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跟我谈改革开放带来的文艺界的思想大解放，抒发因文艺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而进发的欣喜。他与艾青交好，很多名满一时的青年诗人与他有密切交往。能参与优秀人物之间的砥砺交流是人生幸事，尤其在青年时代。这是他传授给我的一条人生经验。我从中领悟到，这也就是当初考进大学的重要意义，因为那里毕竟是优秀青年的聚集地，我陪他爬观剑川石钟山石窟，带他骑自行车绕行剑湖。一路听他谈自己独特的读书体会和写作心得，深受启发。有时候我恍然觉得，他多么像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夜行的驿车》里所写的那位擅写童话的老者。是的，对于美的人和事，他有一种近乎放纵的迷恋。当然，我也看到了他性格中稍许的偏执和急躁，从而认识到名人也是人，人所具有的他们都会有。那段时间，接待工作让我有了很多与名人接触的机会，既增长见识，学到了经验，也认识到了人的复杂性。

工作之余，我主要致力于散文诗的创作。散文诗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文体。我们只要读一读屠格涅夫的《门槛》，波德莱尔的《每个人的怪兽》、鲁迅的《过客》《影的告别》《死火》等篇章，就会知道它们所包含的思想力量和美学浓度绝不会少于一部中长篇小说。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文艺思想的解放，作家们的笔触由对“高大全”的神化回到血肉丰满的人间，由“政治教化第一”的偏废转入兼及审美、认知、娱乐诸功能的全面。求新求变，也成为我写作上的一种导引。那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代，作家往往就是追星的对象。我每天都会收到一些读者来信，生活中也会发生一些被读者围追的趣事。

如今翻看那本书名叫《相思草》的最初出版的小册子，觉得其中的作品真是太幼稚了。但那种嫩生生的、仿佛青草叶片上的晨露般的清新，是青春岁月沁出的记忆颗粒，也是年轻心灵的温热血珠，是我今天

无法复制的。

如今我虽然已出版十余本作品集，并且一本比一本厚，装帧也越来越华美，思想性、艺术性的日趋完善和成熟也显而易见。但最初的作品，仿佛初恋一般最被我珍视，也许更是因为怀念那个“像健壮的青年，有着铁一样的胳膊和腰脚”的80年代。80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人们的需求也不复当年。文学已从异乎寻常的高位跌落，成为阅读的支流。启蒙的、审美的纯粹，有时候已无可奈何地让位于娱乐的狂欢。这是时代的蜕变。

回顾数十年历程，先是物理教员，继是文联干部，在后来的20多年时光里则成了一名繁忙且经常上夜班的报人，自己的文学创作就一直处于业余状态，作品数量较少。“一位作家，作品量多而质高才最值得推崇。可惜我难以做到，也就只好把文章尽可能写好一点了。主观努力如此，客观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在散文集《听雨》的后记里，我曾这样说。“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弦索”，泰戈尔的这句诗，是我一直坚持的理由。

尽管春天甚至盛夏已经过去，至少对于我的生命而言，然而春后还有夏，夏后还有秋，秋后还有冬，冬后又是春。日子就是这样，涨落起伏、周而复始。告别冬天，走过杂花生树、莺飞草长的春季，其实我们的社会生活也进入了夏秋之交。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季节。眼前一派繁茂却良莠杂处，收获似乎丰盛却斑驳迷离。物质涌流的同时雾霾腾起，并且向人心流泄。需要梳理，需要整饬，需要涅槃，需要跨越萧瑟的轮回，重新唤起一种明澈和清丽。我一次次暗暗警醒自己，为了给这种跨越增添一点哪怕是微末的色彩，也应一手举起批判的长矛，一手摇动爱与美的玫瑰，进行属于自己的写作。环顾四野，我发现雾帐撩起处依然有无数的年轻人点燃了他们心灵的火把。这些才华横溢而又目光深邃的幸运儿，不像我们一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们的成长，营养优质而完备；他们的歌声，不仅掷地有声，而且燃跳着青铜和燧石的火焰。尽管这个世界已是五音俱发，但我相信，文学是无法替代的。他们才是即将到来的日子。我不仅要为比我年轻的写作者点赞、喝彩，也希望多与他们交朋友，获得与他们砥砺交流的机会。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又想起了40多年前校园里的那场舞蹈。那飞溅的欢乐是由衷的火苗，更是历史翻新的象征。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用重重叠叠的脚印遍刻写的是奋斗和艰辛的历程。应该一如既往地前行，和祖国一起去迎接更加耀眼的荣光。我们虽已老去，但新中国依然有着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沧海万仞，众流成也。我希望在祖国一次次跳起的青春圆舞曲里，人们能认出其中舞步蹒跚却又在沟壑纵横的脸上绽开朵朵鲜花的那一个是谁。



記
羅馬·靜物
威廉·貝利作
手稿

砚田风采照人间

——和田本相先生交往侧记 □宋 娜

3月5日，同门和其他好友陆续转来田本相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先是错愕，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3个月前还曾去田先生家拜访和请教过他。那时候田先生除了有些消瘦之外，看起来似乎一切如常。春节期间听一位师长谈及他病重，我还不以为意，觉得哪里有那么夸张。没想到现在，他却永远地跟这个世界道了再见。消息证实后，我长时间沉浸在懊丧和遗憾的情绪中。

我不是田先生的学生，却因为博士论文的关系拜访过他，和田先生有过一些交流。论文开题后，导师邹虹曾就选题范围和个案选择跟我反复斟酌。考虑到田先生的传记是重点阐释和分析的对象之一，邹师跟我说：“你去拜访一下田本相先生吧。他的《曹禺传》至今在学术界都是不可超越的，奠定了曹禺研究的基础。请他给你一些意见！”我自然心下大喜。田先生是国内戏剧研究领域的泰斗，曹禺研究专家，能得到他的指导，对于厘清思路自然会事半功倍。

邹师的《田本相和新时期曹禺研究》发表在核心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是一篇影响力较大的文章，对田先生学术风格、地位、影响和意义都进行了客观而不失公允的系统评价；而后来见到田先生后，他则跟我提及，邹师是第一个从精神分析角度研究曹禺的作者。

我随即找机会跟田先生通了电话，并提前把开题报告和论文提纲发到了他的邮箱。很快，大约过了两周，田先生约我去他青年路附近的家里一见。

进门来，却见田先生已经沏好了茶。

“对戏剧家传记整体研究是有意义的，别人还没有专门写过。有一篇专门研究田汉传记的，你可以找来看看。”田先生开门见山地说。

我赶紧记下来。田先生又说：“戏剧家传记里写得好的，有董健的《田汉传》。1985年国内

清代书法家伊秉绶有言，“惟砚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

田先生的微信名是“砚田”，不知是否来自这一典故。以砚田为名，这也是他对自己以笔为犁、以砚为田而笔耕不辍的形象写照。而对方砚田，不但给现代文学、现代戏剧研究开拓了一片独特的学术原野，还烛照出一代学者睿智、平和、包容而又爱憎分明的人格光辉。

在武汉召开了一个田汉研讨会，学术界这才引发了田汉研究的高潮。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要出版田汉传记，我向他们推荐了董健。他写得很不错，值得研究。另外，夏衍传记也要加进来。夏衍在戏剧史上的意义很大，他是左翼戏剧，但却不是说教式的。夏衍传记写得好的有陈坚，你可以上网找一下一些学者爱端的名士架子，也

没有“大牌”脾气，更不存在什么功利心，有的只是对学术的热爱和对晚辈的一片关心和爱护。谈话如沐春风，我的拘束少了很多，思路也开阔了很多。

这次见面没过多久，田先生又在微信中嘱咐

我多看外国名人传记，“如果你写传记就多看看外国作家写的名人传记，我也是学别人的。”我想起来田先生在《曹禺传》后记中曾多次提到罗曼·罗兰、茨威格等人的传记，赶紧买来看。没过几天，他又转发关于莫耶峰《杜甫评传》的一篇文章，供我参考。接着，他又转给我一篇《学术论文的六个关键方面》，提醒我注意学术论文的规范，如何选材和提出论点进行论证。他不是我的导师，却又这样关注着一位籍籍无名的后生晚辈的论文进展。我心下默想，只有把这份感动化为思考力和笔力，及早把论文写出来，而且写出深度来，才对得起他的关注。

论文初稿出来后，我赶紧提前发到了田先生的信箱，请他给我指导。大概一个月后，田先生约我见面前，发来信息说：“对不起，最近才看完，如果下周一有暇，可于下午三时来家里一叙。主要是身体欠佳看得慢了。”他语气客气而真诚，我则

十分不安而惭愧，为田先生的认真、负责而再次感动。这本来就不是他的分内事，是我在打扰他，增加他的额外事务。他提到身体欠佳，迟钝如我，还以为只是冬季易发的感冒一类小事。现在想来，可能那时候田先生就已经身染重疴。

到了约定的当天上午，田先生一早发来信息说，“医生通知我下午住院复查，如果你上午有空来家里谈也可，要不就等我出院再说。”因我的单位距离他的住处不远，我赶紧回复：我现在马上过去。上次见他还很硬朗，可能只是一般的复查，我依旧没有多想。

及至我赶到田先生家里，见家里氛围一切如常，只是客厅里多了一张医用床。田先生的爱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能是怕打扰我们，声音开得很小。田先生则消瘦得厉害。我这才觉得情况有些严重，连忙问：“您身体怎么样？”田先生说：“没什么大事。就是例行复查，可能要住一阵子医院。”我说，“您比上次我见您时瘦了很多。”他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不过又认真地回复我说：“体重掉得不多，还是49.5公斤。”我不禁赧然，觉得他似乎不愿意多谈自己的身体状况。看他神情淡定如常，我又侥幸地想，不至于有什么大事，也就没再多问。

田先生家的餐厅靠近客厅，我们分坐在他家饭桌的两侧。田先生双手撑在桌上，头略下沉。毕竟已是86岁的高龄了，这可能是身体机能弱化的一些正常反应，我想。

谈到论文，田先生说话依旧思维清晰、逻辑严密。他对我鼓励有加，肯定我做了一些基础工作：“你写的资料很扎实，下了功夫。”然后，他又对《曹禺传》的独创性做了说明：“把谈论的东西加到里面，这种写法过去的传记中还没有。”又谈到曹禺的“苦闷”：“曹禺为什么苦闷？我原先读过心理学的东西。对曹禺苦闷的发现，影响了以后

曹禺研究对曹禺的认识。这一点跟研究鲁迅贯穿起来了，鲁迅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也是苦闷的，伟大的作家都是苦闷的。此外，我对曹禺的童年经历下了功夫，研究一个作家童年和少年时期非常重要。揭示了他内心苦闷的来源。”“对家庭生活的描写也是一个。写完曹禺传之后，引发了一个曹禺研究的高潮。”田先生这么总结，“写传记，不能离开这个人的家庭生活。”

他嘱咐我分出次主，不要一把抓。要在章节上有侧重，篇幅要剪裁。“要在评价上，更露出你写的东西的传记史。”谈到最后，他对我一些学者的私德进行了批评，“不入流的不能研究。”对一些在学术上以发奇绝怪论、哗众取宠的做法进行了批评，甚至有些激动。这样的田先生又是好恶分明的。

尽管我从文献中已经能发现戏剧家传记的脉络和线索，但真正听田先生自己谈，还是更能验证和补充一些认识。我赶紧都记下来，这些意见太有启发意义了。回来后，我把田先生的意见进行了整理，在论文中作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现在想来，他那天下午去医院，应该已经是饱受病痛之苦了，他却还惦记着一个后辈晚生的约见。田先生并无指导我的义务，他大可以就此推掉，也不必如此认真和尽心尽力。我想，这一方面源于我导师的推荐，他对我导师非常信任，对他推荐的学生自然也就无条件信任，这显示了田先生性格中重情义和宽厚待人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他内心携爱恋宽厚的本能使然，这种爱护无关其他，只是单纯源自对学术的热爱。我曾想着论文写好后再给他看一遍，否则对不起他的一番苦心。如今天人两隔，这是再也无法弥补的憾事了……

清代书法家伊秉绶有言，“惟砚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田先生的微信名是“砚田”，不知是否来自这一典故。以砚田为名，这也是他对自己以笔为犁、以砚为田而笔耕不辍的形象写照。而对方砚田，不但给现代文学、现代戏剧研究开拓了一片独特的学术原野，还烛照出一代学者睿智、平和、包容而又爱憎分明的人格光辉。

是为纪念。